



赵占明：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积极开展绿色GDP的研究试算

中国统计信息网 2004.03.31 17:31:25

山西张宝顺省长在省人大十届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积极推进绿色GDP核算，对各市污染总量控制和环境质量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年度考评，社会公布，公众监督”。这是省委、省政府在近几年来狠抓结构调整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础上，依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提出的新的战略思想，它标志着我省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朝着理性化、科学化发展的新的开端。但由于此项工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难点突出，国际国内尚没有一套较为成熟的方法，因此实践中需要认真调研，精心组织，科学部署，汲取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合理展开各项工作。现就当前的研究谈几点体会。

一、用历史的观点科学评价GDP

国内生产总值（GDP）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被世界各国所采用。我国自1985年建立GDP核算制度，1992年之后逐步建立起一套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GDP成为核心指标。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活动成果的集中体现，目前，这一指标已成为各级政府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和战略目标的重要依据，并成为家喻户晓、世人关注的经济“晴雨表”。

应该看到，GDP的积极效应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到2000年，我国的GDP已达到89442.2亿元（折10800亿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6.4倍，年均增长9.5%，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位。GDP的高速增长，不仅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和丰富，增强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政治地位。

但是，随着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加重，GDP越来越暴露出它的缺陷：它仅能反映经济活动中“货币化”的部分，体现经济发展、繁荣的一面，而不反映对资源、环境的消极影响的一面；它将各种社会引发的财富都计入了GDP增长之中，而不考虑不好的社会行为对社会发展的恶劣影响。因此，仅就GDP来看，它容易过高地估计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给人一种不全面的社会经济图像。特别是对依赖于开发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产资源和森林资源获得重要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些缺陷尤为突出。

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尚未摆脱粗放型的增长模式，生产工艺总体上还相对落后，GDP的高增长率与高消耗、高排放相伴随，造成了资源的惊人消耗和数量巨大的污染物排放。另外，我国的政府职能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GDP增长在各级党政干部的政绩考核中的极端重要性，使得短期利益和短期行为屡禁不止。发展经济往往“压倒一切”，环境和生态保护只能为经济建设“让路”。在此情况下，GDP带来的对资源和环境的负面作用就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

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对我国政府近年来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比如，由于发展农业工作难度大，但相对经济效益低，对凸显“政绩”作用不明显，有的地方就不重视农业，甚至用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的办法来实现GDP的高速度；有的地方乱圈地建开发区，造成农民失地、失业又失保障，或者用加重农民负担的办法建“形象工程”。许多地方不把主要精力和财力放在解决薄弱环节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基础教育设施建设、重大水利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力度得不到加强，开发扶持落后地区的政策得不到倾斜，薄弱环节和贫困地区的面貌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变。

由于GDP逐渐演变为一些地方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各地经济总量增长或“率先发展”的第一表象就是GDP快速增长，因而对GDP的追求成为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心照不宣的职业使命。为了GDP数字的增长，可以不计代价和方式，甚至在关停并转和治理整顿的形势下盲目扩张，大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掠夺性建设开采，过度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出现GDP增长的异化——虚增长、短期突击的增长或结构失衡的增长。甚至从追逐GDP，到唯GDP，最后到直接在GDP上做手脚，污染GDP。

可持续发展的要义在于可持续，它不仅是当代人的可持续，而且是子孙后代的可持续。以往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二、科学发展观呼唤绿色GDP

绿色GDP在理论界的提出已有一段时期，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它的意义凸显出来。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新发展战略，其核心贯穿了“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和执政理念。

一场SARS危机给了我们许多启示。温家宝总理说：“一个民族在危机中可比平时学到更多。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意味着新一届领导集体在痛定思痛、总结教训后树立新的发展观、构建新的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大家逐步注意到，在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定量评估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目前使用的经济指标和核算体系暴露出重大缺陷，以此来评估发展问题，难免会背离可持续发展的轨迹。

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绿色GDP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就进一步显现出来。必须把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从根本上改变党政领导的政绩观，推动粗放型增长模式向低消耗、低排放、高利用的集约型模式转变，从而真正把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到经济建设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可以说，绿色GDP概念的提出，找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效利用资源的一个结合点。实行绿色GDP成为贯彻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新发展思路的一个切入点。

“绿色GDP”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呼吁健康的经济增长方式，反映了在体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前提下的经济增长。但是，目前经济可持续发展乏力以及非环保型企业得不到根本整治的重要原因远非一个GDP能够包揽。

把“绿色GDP”上升到政策高度非常必要，但是，搞“绿色GDP”不能只盯在统计的层面上，毕竟，引入“绿色GDP”，关键不在于如何计算GDP，而在于如何“绿化”GDP，“绿化”我们的经济行为。即使绿色GDP的核算体系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它也只能是政绩考核中的一个指标，其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不可能制止政绩追求中全部的非理性冲动。

相当一部分GDP可能在“绿化”过程中漏网，因为它几乎与环境污染、自然生态平衡以及资源的过度开采无关。比如耗费巨资的各类“形象工程”，这部分GDP是引起百姓义愤、损坏党和政府形象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某些地方党政领导追求政绩中的非理性冲动的直接体现。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GDP问题是需要改变的重点之一，而干部监督和考核制度问题则更为关键。需要在政绩观操作层面上研究内在规律，制定科学、实际的规则。

三、新国民经济核算理论面临的技术挑战

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欧洲。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估算国民收入。1947年，联合国发表了第一个包括五张核算表和四张补充表的简明帐户体系。1968年正式推出了《国民帐户体系》(A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1993年在有中国代表参加的联合国第27届统计委员会上一致通过，各国建立统一的国民核算体系，即SNA核算体系。

目前，我国与国际接轨的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主要包括五大核算（生产总值、投入产出、资金流量、国际收支和资产负债）、七大帐户和两个附属表（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人口资源与人力资本实物量核算表）。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SNA的龙头指标，在GDP中扣除生产资本的消耗（折旧），可得到国内生产净值（NDP）；在GDP中扣除自然资本的消耗，得到经过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绿色GDP（即G—GDP）；从GDP中同时扣除生产资本消耗和自然资本消耗，得到经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称绿色国内生产净值（即G—EDP）。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将自然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建立资源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拓展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功能。但是，当前实行绿色GDP存在许多重大难题：

一是“绿色”的范畴尚不明确。目前，绿色GDP只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就像一个美丽的“神话”，给人们以向往和追求。但其具体标准和界线尚还不清楚。因为，世间万象千变万化，人类的生产活动多种多样，同时，与之相伴的消耗、排放或破坏，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的标准。过去认为是绿色的东西今天也许就不怎么绿了，今天的绿色明天可能就变“灰”或变“黑”了。搞清概念是统计首先要解决的课题。如废水的排放，可灌溉和可饮用就是不同的绿色标准。

二是资源环境的实物量核算尚不健全。资源环境的核算通过两种基本手段来实现，即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价值量核算要建立在实物量核算的基础上，而我国对自然资源 and 环境的实物量的核算尚在研究之中。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附录表”中的一张“自然资源实物核算表”目前尚未全面实施。

三是资源环境如何定价。资源、环境是无价的。能够市场交易的资源可用市场交易价格来估价，但不能交易的各种资源的估价就争议很大，特别是相对于自然资源，无形环境的价格就更不容易确定。

四是微观的“绿色会计”还有待建立。绿色会计核算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微观基础，从我国会计理论与实践看，科学合理、系统完整并符合国情的企业绿色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还有待研究，具有可操作性的绿色会计准则还没有建立。

五是资源环境的损耗与经济发展不同步。比如，工业污染引发的生态破坏和健康损失是污染发生之后逐渐显现的，有的需要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才被发现，其成本算到哪一年才准确难以确定。再比如物种的灭绝，很难把它归结为哪一项经济活动。

尽管目前国际国内有关机构和学者付出了巨大努力，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难题都还没有解决，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的现实需求与有效供给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因此，有的专家提出，在呼唤绿色GDP的同时也要问一下：我们准备好了吗？

四、分清层次，阶段推进，为开展绿色核算创造条件

我国要正式建立和采用绿色GDP核算体系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一个地方，结合科学性、理论性、前瞻性和适用性的原则，对绿色GDP进行测算，以加快绿色核算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制度建设，适应可持续发展需要，则是完全可能的。

在开展绿色核算之前，有几个观点需要形成共识：

（一）关于绿色GDP的范畴

绿色GDP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改变。当前的绿色GDP只能按照当代的“绿色”标准做出界定。

因此，绿色GDP就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当前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条件下，扣除了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后的GDP总量、速度及其构成。

它包含三个基本要点：（1）它反映满足可持续要求的发展，即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2）它是在现有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条件下的“绿色”，是适合当前定量计算的绿色；（3）它是在扣除了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后的“GDP”，是对GDP核算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二）关于绿色GDP几个层次的划分

为使绿色GDP由“神话”变为实际，我们不得不对客观现象做出某些现实的规定。对经济发展的“总成本”可分为以下四类：

（1）人造成本，即原材料、燃料、动力及服务等的消耗（费）。这部分成本已在GDP核算中扣除；

（2）环境成本，即社会生产活动所造成的污染物排放的治理成本，其中工业和城市的“三废（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是主体，也是当前急需治理的主题；

（3）资源成本，即社会生产活动所耗减和破坏的矿产、森林等资源的价值；

（4）社会成本，即一切非理性活动的社会影响，包括生产活动中的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和其他灰色经济造成的长期的社会影响。

（三）以“绿色环境GDP”为首攻，阶段推进绿色核算

GDP需要一个逐步“绿化”的过程，需要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此项工作，逐步积累经验，不断完善绿色核算方法。

在目前的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核算条件下，可以选择环境成本（二类成本）为首攻对象，核算“绿色环境GDP”（简称“绿环GDP”）。因为，当前党政重视、群众关注、社会影响巨大的焦点是环境问题，而工业和城市的“三废”排放是影响环境的主要因素，并且“三废”统计又有一定的基础，因此核算“绿环GDP”在当前具有现实可能性。

资源问题（即三类成本）固然重要，但一方面，它的开采和利用受政策因素和生产水平限制较大（如山西不可能因为资源受损就不去挖煤），核算资源成本的难度奇大，而作用却不十分显著；另一方面，资源问题比较直观和单一，更多的可运用政府直接干预的手段进行限制或调节，如关闭小煤窑、价格调节用水等等。

环境和资源问题的长期社会影响（即四类成本），其核算条件尚不具备，目前还不太可能，我们可通过环境的治理来逐步消除其影响。

从一个发展观的形成，到一个新的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要有一段较长的路程。我们要吸收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和方法，把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抓紧建立健全相关的监控、预警和考核体系。

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精确还是粗略，只要能尽快在社会经济发展与相应的环境资源代价之间建立起某种对比关系，从而为政府、企业与公民的发展、生产与消费决策提供有益参考，就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绿色GDP的用意在于“绿化”经济。当我们把“绿色GDP”放在心上的时候，我们经济前行的道路，想必会迎来更多的“绿灯”。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既看到准确的GDP增长数据，又看到这一数据背后的环境成本，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提供科学的量化依据。（山西省统计局）

[附件](#)